

■思想

工业经济只是一次美丽“例外”

——循环经济随笔之十

现代工业经济——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天经地义地认为也将永远持续下去的经济形态,很可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一次美丽的例外。工业经济建立在石化能源基础上,而石化能源虽然是地球经过数亿年地质演化才逐步形成,但使用起来却只需要短短数百年。

■直言

公司生命周期不同 分红大有讲究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经济宏观层面的利好消息不断刺激投资者对股市未来的美好预期。虽然官方的保守估计是今年增长率不低于8%,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态势,很有可能和去年持平,即使存在某些扰动因素,或者政府的调控因素,也最多让增长率略降而已。面对低通胀和高增长的喜人局面,投资者不能不打起小算盘。好在上市公司似乎也很配合,按照现有的已披露的分配预案,派现的公司有增加的趋势。鉴于相当数量公司还未披露年报和分配预案,暂时还无法判断具体派现的公司数目,但这个趋势似乎存在。特别是驰宏锌锗(600497)发布了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0股并派发现金红利30元的分红方案,更是被人们称为创下了中国A股历史上最大的分红纪录,其股价也一度飙升到百元以上。

驰宏锌锗的股价变动体现了投资者偏好红利支付的回报方式。过去中国A股市场为人们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市公司太吝啬,没钱的不分红,有钱的也不分红,就有点伤投资者的心了。至于后来证监会不得不出台相关政策来强制实施分红。按照当时的要求,如果一个公司想再融资,无论是增发还是配股,分红记录设定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股改之后,上市公司这种自觉的分红行为倒是减轻了证监会的负担。

派现的上市公司比重上升,不仅是因为A股市场的公司盈利面增大了,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层面的变化。首先,股改使得原先被锁定的非流通股在价格上和原先的流通股趋于一致,有了共同的利益目标,大股东也就有动力通过分红来刺激股价,这样不仅自己可以凭借较多的股票份额分享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可以享受实实在在的高股价,一举两得。

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是来自机构的压力。机构力量现在越来越强大,日益壮大的基金业已成为与原先大股东抗衡的重要势力。现在翻翻蓝筹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名单,基金公司举足轻重。由于基金要对投资者的收益负责,所以反过来会使上市公司多分红。

但是,从公司支付政策本身来说,并不能绝对地拿高分红说事。现金支付有好处,也有坏处。要看如何权衡其中的利弊。红利支付是培养稳定的投资者群体的重要一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教育来促使投资者成为中长线的稳定股东,投资者都是自利的,都是为了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既然如此,就应该通过经济杠杆来引导投资者做中长线投资,也就是说,让投资者觉得做中长线要比做短线赚钱。分红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一些金融学家把股利支付看作是好公司的信号。

股利支付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解决詹森所说的“自由现金流”问题。按照詹森的说法,如果一个公司盈利好,存在较多自由现金流,那么就会出现代理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代理人,公司高管可能把这些自

从小,我们就听过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水温逐渐升高而青蛙们却不知,最后断送了性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管讲故事的还是听故事的,今天实际上都已陷入了青蛙们的困境。

有关资料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地球温度上升了0.6摄氏度,导致了地球上由风暴、洪水、干旱等引起的各种天灾明显增多。据统计,2000年地球发生的天灾数是1996年的两倍。专家们认为,即使人们从现在就开始采取措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地球的温度依然将惯性增长,自然灾害数量将以6倍的比率增加。最新科研则证明,北冰洋冰块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融化。所有这些迹象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人类已经泡在“一池温水”之中了,有一天可能会在温室效应的热浪中“渐渐死亡”!

可叹的是,迄今为止大多数人没有对这给予过关注,更遑论采取实际行动了。其原因除了人的贪欲在作祟——每个人都愿放弃追逐财富的步伐之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往往能够产生激发,但对缓慢降临的灾难却明显缺乏抵御能力。在这点上,人类与青蛙相比,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

当然,毕竟人类的智商还是要比青蛙高出一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一潜在的巨大风险。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本书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这本书现在被看作是《环境经济学》和《循环经济》的共同起源,受此影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很快,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结论:现代工业经济——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天经地义地认为也将永远持续下去的经济形态,却很可能只是人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

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次

美丽例外。理由在于,工业经济是建立在石化能源的基础上,而石化能源虽然是地球经过数亿年的地质演化才逐步形成,但使用起来却只需要短短的数百年。换句话说,工业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仅是因为人们发现了石化能源这笔“意外之财”。很显然,未来如果不能继续发现新的“意外之财”的话,当这些石化资源被用尽的时候,整个工业经济大厦就会轰然崩溃。而且,由于在消耗石化能源的过程中,污染将会逐渐严重,环境质量将不断恶化,粮食产量也将远低于现在的水平,许多人也将缺乏粮食而饿死。

无疑,人类的悲剧是否能够避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我们能否找到相对廉价的新能源。但是,谁又能在这件事情上背书呢?相反,让人悲观的理由简直俯拾皆是。

从20世纪中叶以来,地球表面的土壤已经损失五分之一,热带雨林损失五分之一,成千上万种植物和动物已经灭绝,许多森林消失,湖泊干涸。而且,一些专家认为,温室效应已经进入了正反馈循环之中,全球升温将不断持续。他们相信甲烷的发热与全球升温有关,甲烷的增多会造成全球气温上升,使现在被封锁在冰川内的甲烷释放,而甲烷的增多又会进一步促使气温升高,进而又会造成更多的甲烷被释放,如此循环,地球上的气温最终将融化冰川,变成一个“未来水世界”。为此,有人提出,通过立即限制人口的膨胀和停止经济增长来避免过度消耗,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

正如其他一切事物一样,



如果温室效应再不尽快被有效遏制,人类恐怕真的要为工业文明唱曲挽歌了

有赞成,就会有反对。反对派列出了至少四点理由。首先,自人类有记录以来,生活标准的总体趋势始终向上增长,随着收入的增加,人类很少遇到严重的短缺,费用也更低,可用资源也在增长,包括环境的清洁以及更好的自然娱乐区域,所以不能轻易就下结论,认为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趋势就会扭转。其次,在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许多悲观的预言,但最终的事实都证明了它们的荒谬可笑。1920年,美国《地质普查》首席地质学家曾经断言,由于地球剩余石油仅有70亿桶,以当时每年5亿桶的消耗速度计,美国石油资源只能用14年,即到1934年。但是到了预言年,全世界石油资源不仅没有耗尽,而且还多探明了120亿桶石油储量。

第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污染曲线会形成一根倒“U”字形。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将会更为迫切地要求改善环境,污染程度将会逐

渐下降。第四,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会发挥作用。按照市场供需原理,一旦某种资源接近稀缺,其价格就会上涨,使得人们更少地使用和更多地开发这种资源,这些反应都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

反对派的意见听起来当然让人们舒服多了,但给人的感觉却很不踏实。毕竟,石化能源终究是要耗尽的,耗尽之后该怎么办?乐观的反对派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现代循环经济已抛弃了最初的极端悲观思想,走上了一条折衷道路,其目标就是需要通过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为人类争取更多的过渡时间。在理论上,如果循环经济在全世界都得到完全实施,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利用率能够提高4至10倍,人类的石化时期甚至能够再延续几百年。到那时候,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类应该能够找到低成本开发的新的能源了。否则的话,工业经济可能就真的会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美丽泡沫了!

■转型深圳

城市群已成国际竞争基本单位

全球化的飞速进程改变了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方式,其合作与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而是中心城市及其所在的城市群,因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能够有效地从更广的范围配置资源、安排市场、布局网络,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互补的创新格局,并以此为基本单位展开对全球经济往来与合作。

在我国,东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如今已

经成为全国经济重要的三大增长极。早在2002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城市蓝皮书》就指出:这三大城市群的

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只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总额更高达73%。这说明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和增长不是个别城市经济总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于集聚和扩散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实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目前,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2万亿元,大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九分之一,已是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最大的经济增长与辐射极核。在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由于香港和广州的点线呼应,托起了诸如深圳、东莞以及珠三角西岸一大批的新兴城市,又由于深港、广州等中心城市辐射极核的形成,珠三角正在产

生城市群经济圈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并且这种能极扩散的效应越来越明显。

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全新经济竞争格局,决定了任何城市的定位都必须联系自身所在的城市群。就珠三角而言,正在形成的城市群的地域首先应该打破行政区划的观念,关注相关城市之间的经济、地域等相关性,因为城市群首先是一个经济圈和社会圈,不是一个行政区域。

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集聚过程,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由于收益差异而导致由外围向中心的集聚,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外围经济的衰退,使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另一个是扩散过程,表现为生产要素由中心向外圈流动,使区域不平衡差距缩小,并促进和带动外围经济。

城市群区域内各个城市的集聚过程与扩散作用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依托一定地域基础与物质条件,包括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历史基础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城市相对集中过程中又会产生城市扩散,构成城市群的布局形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伯吉斯(E.W.Burgess)认为影响城市向外扩散的有向心、离心、专业化、分

离等因素。霍伊特(S.Hoyt)则强调了交通可达性和定向惯性的影响。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霍利(Hawley)于1981年提出以下对城市扩散作用的影响因素:A、绝对的人口压力;B、城市中心诸功能之间专业化和相互竞争的发展,把不具优势的职能向外驱逐;C、物质结构的老化;D、短距离运输方式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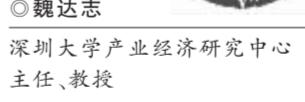
尽管城市群内各市呈现能级均衡态势,但各市的区位、规模、技术知识与人才等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各市的创新发生不均等。城市群内总存在一个或两个核心城市,作为增长极核。大多数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都发端于增长极,然后辐射到整个城市群。

在这种城市群均衡的主要路径中,增长极进一步发展是轴向扩散。从城市群发展过程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形成点状分布。这种经济中心既是区域的增长极,也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的需要,需要交通线以至动力供应链、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轴线。轴线一旦形成,对人口产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点轴贯通,就形成点轴系

统。点轴开发是城市群自发形成与演进的主要模式。

点轴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群,可进一步开发可采用网络扩散模式,构造现代城市群空间结构。网络开发是城市群已有点轴系统的延伸和强化,可增加城市群各城市(镇)与各地域之间,特别是城市(镇)与地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促进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而点轴网的形成,亦即点线圈的形成,在城市群的能级增长上将发生几何级数的飞跃,即产生1:3:9的能级效应。就目前的情形看,深、港与珠三角、甚至泛珠三角之间由于产业关联和经济关联引发的巨大经济流量,形成点轴网,包括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品流等等,将会对周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包括城区的总量增长、存量优化、增量扩张、流量扩大、质量提升,由此使得整个城市群能极呈现几何级数的飞跃和提升的前景非常诱人。



◎魏达志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地方师范生 享受免费更合理



◎高明华
北京师范大学
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今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举措,这在教育界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赞成者大有人在,而质疑声也有不少。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但不太赞同在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中实行,而应在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师范院校中实行。

经济学有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即人都是有理性的,换句话来说,人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中国也有一句古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与中国的这句古语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尤其是坐落于中、东部的四所师范大学,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生源质量本来就很高,考生是凭借自身的巨大努力和获得的高分进入这些师范大学的,他们毕业后的期望值相当地也很高。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其期望值显然不是到西部支教,而是进入繁华的都市就业,即使当老师,也是在都市当老师,而且重点大学提供的都市就业的机会也很多。试图通过事前合同约定的方式让他们先到西部支教三年,恐怕与其期望值相距甚远。更何况,三年后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要为这些不确定性“买单”,或者说要付出成本,而这些成本是否低于当初因免费而少支付的教育成本,则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部分学生有到西部支教的崇高理想,不过,这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不矛盾,因为“收益最大化”中的“收益”并非一定是物质利益。但是,就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区域差距看,追求物质利益无疑还是第一位的。

从目前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看,尽管老师早已不是过去的“臭老九”,物质待遇也大大提高了,但相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远远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高,平均收入至多也只能纳入中等阶层,笔者曾参加过很多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大部分情况下,接待官员的规格都高于教授,甚至排座次,一个处长都会优于教授。在笔者家乡,一个科级干部回乡会威风凛凛,百姓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而我这个教授回乡则较少有人理会(更何况中小学老师)。因此,追求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高于教师的其他职业,成为莘莘学子的理性选择实在无可厚非,尤其是那些付出高昂成本考入重点大学的学子,就更是如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条件好的都市寻求好的职业,以期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更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回上学的成本。

相对来说,对于考入地方师范院校,尤其是西部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由于个人努力、天赋、家庭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入学的成绩不高,其未来就业的期望值也相应地会低一些。尽管其中不乏志向远大者,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考研,希望再跳一次“龙门”,也像重点大学的学生那样,赢得有更多的进入都市就业的机会。但社会提供给他们再跳“龙门”的机会有限,成功概率也不高。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可能要在当地寻找就业机会。如果这时政府扶持一把,即提供免费教育,那么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是愿意在当地当教师的,尽管内心可能有不情愿的成分。由于上学是免费的,毕业后在当地或者西部就业当老师的收益尽管不高,但能够弥补较低的教育成本,收益减去成本是正数。如果他们不接受免费教育,毕业后在当地或西部当老师的收益就很可能低于教育成本,而在较长的时期内弥补不了,毕业后仍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户口限制逐渐放开,劳动力流动逐步加速的情况下,即使地方或西部师范院校的学生,也会到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此时收益增加的期望会增加,免费师范生教育的吸引力也就随之下降。因此,鼓励师范生(也包括非师范生)当教师,尤其是到西部地区从教,关键不是四年的免费教育,而是极大地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解除教师的各种后顾之忧,使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

最后重申,我是拥护师范生免费政策的。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享受免费大学教育的学生更多一些,其中包括非师范生以及所有家庭困难的学生。因为大学是否收费,收费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而是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有不少“穷国”的国民享受着免费教育,就是很好的例证。